

北京

佛教石刻

Stone Carvings About Buddhism In Beijing

拓展北京地区碑刻文化的研究范围
填补北京佛教碑刻文化研究的空白
为开展北京佛教的后续研究或古代社会文化研究
提供宝贵的原始材料

佟洵 ☐ 主编
孙劭 ☐ 编著

北京宗教史系列丛书

所有勸業異政氏族具如幢文故此不書

生天真言曰

娑縛合賀引

宗教文化出版社

Stone Carvings About Buddhism In Beijing

北京佛教石刻

佟洵 □ 主编 孙劭 □ 编著

北京宗教史系列丛书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佛教石刻/佟洵主编;孙勣编著.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6

ISBN 978-7-80254-550-2

I. ①北… II. ①佟…②孙… III. ①佛像-石刻造像-介绍-北京市

IV. ①K879.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26995号

北京佛教石刻

佟 洵 主 编

孙 勣 编 著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44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01(编辑部)

责任编辑: 王鸣明

版式设计: 高秋兰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880×1230毫米 32开本 14印张 300千字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4-550-2

定 价: 35.00元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重点规划项目
“北京宗教史”阶段成果之一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北京学基地研究项目
北京市北京学研究基地 资助项目

《北京宗教史系列丛书》编委会

顾 问：申建军 黄信阳 季文渊 马中璞
程二雁

主 编：佟 洵

编委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洪 王新蕊 孙 勔 佟 洵
杨靖筠 张宝秀 罗 飞 徐 威

总策划：佟 洵 张宝秀

总序

自古以来,北京地区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大舞台。北京房山区周口店山顶洞人墓葬群以其特有的墓葬方式告诉我们:距今1.8万年前人类的祖先已经有了灵魂观念,原始宗教信仰大约在母系氏族社会这一时期产生了。自此,原始巫术宗教中的萨满教在民间一直流传,晋朝佛教在燕地建庙传布,道教全真派祖庭白云观是由唐代幽州的天长观发展而来,牛街礼拜寺是伊斯兰教在宋辽之际传入北京的佐证,元大都是景教和天主教主教区,房山景教十字寺遗址记述着元代景教在元大都的繁荣,南堂、北堂、东堂记载着天主教再次在北京传布的历史,西黄寺、五塔寺、雍和宫述说着藏传佛教在北京的辉煌等等。北京宗教有着上万年、上千年的历史传承,其宗教遗存的种类之全、数量之多,艺术之精湛、保存之完美、文化内涵之丰富,是世界闻名的。

美国城市社会学家 R. E·帕克曾经说:“城市是一种

心理,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也就是说体现一个古老名城的标志,不仅仅与其传统文化有关,而且也与其宗教载体密切相关。北京宗教的载体——寺庙观堂在千年古都北京的物质生活中、文化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有的和中国重大的历史事件有关,有的和历史上的著名人物相联系,可以说北京的寺庙观堂本身就是历史文物,或者珍藏有罕见的文物和图书的艺术宝库。这些寺庙观堂赋予了北京极为丰富的宗教文物遗存,它们不仅是北京宗教物化的形式,而且具有传播和承载北京社会历史与文化的功能。北京宗教间接地反映着千年古都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状况,为人们考察、了解北京这座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客观的脉络与历史轨迹,并且成为展示北京城市精华集萃中的一个亮点。正如罗哲文教授所言:“面对祖先为我们留下的如此丰厚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遗产,如何更好地去保护和继承它,使之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服务,为国际国内文化交流做贡献,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和应承担的责任。”

近年来,国内外学界有不少研究北京宗教与文化的成果相继问世,但是这些成果多为研究北京宗教古迹、文化艺术、人物传记和方志类的著述,而系统成套地介绍北京宗教史的丛书,尚属阙如。

北京宗教集中国数千年宗教发展之大成,汇集了大江南北宗教的精髓,从其形成与发展的角度来看,它折射

出中国宗教演进的轨迹,是中国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从北京宗教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去透视中华五千年的历史和文化,了解外来宗教本土化的历史过程,更好地吸收历史上一切美好的东西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有鉴于此,在北京市北京学研究基地主任、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院长张宝秀教授的全力支持下,我们共同策划了北京宗教史这一系列丛书。

北京宗教史系列丛书共分为八部(含附卷二),即北京道教史、北京汉传佛教史、北京藏传佛教史、北京天主教史、北京基督教史、北京伊斯兰教史。由于北京道教碑刻和北京佛教碑刻颇丰,故将“北京道教碑刻研究”和“北京佛教碑刻研究”以丛书附卷而单独成书。本丛书在充分吸纳学界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注重对文献资料按照纵向的历史时期和横向的传播途径进行梳理,注重理清各大宗教在北京地区传播的轨迹,分析其发展脉络,揭示北京宗教传播的规律和特性。本套丛书在研究中注重对北京宗教遗迹、寺庙观堂、碑刻等宗教载体进行实地考察与研究,注重对口碑资料的收集,以其弥补史料记载的不足或失误,核查文献记述的准确性,为本丛书的完成奠定了客观科学的基础。

本丛书写作架构采用编年与纪事本末结合体的体例,由于北京联合大学民族与宗教研究所已经先期出版了《当代北京宗教史》,故本丛书对各大宗教形成与发展

的历史只写到民国时期。北京宗教历史跨度漫长,既有本土宗教、又有外来宗教,同一宗教又有不同的派别,是一个巨大的研究体系。因此,本套丛书要全面、准确、系统地展现北京各大宗教的历史全貌,外来宗教如何实现本土化的过程,及其为北京营造“国际都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在构建和谐社会、建设“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中的地位与作用,无疑是一桩艰难的任务。

由于本套丛书为补白之作、众手集成,因其涉猎内容广泛,知识点繁多,作者水平有限,书中定会存瑕疵和纰漏之处,殷切地期盼广大读者、学者、专家、广大信众及时赐教与指正!我们定会“从善如流”,不断地提升我们的撰写水平和丛书的质量!

丛书主编:佟洵

2010年10月24日

前 言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在人类社会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佛教起源于公元前6-5世纪的古印度,之后开始向周边地区传播。根据现存文献史料的记载,佛教传入我国国内地的时间较为可信的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西汉末年的汉哀帝时期,另一种说法为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因此,把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时间定在两汉之际,应该是较为合理的。从佛教传播的路线来看,应该有两条,在北方,由印度经过中亚,沿着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内地;在南方,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到达广州、胶州等东南沿海地区,再传入中国内地。佛教最初是作为一种异域的外来宗教文化出现在当时社会之中的,但是,佛教以其教理的多样性、圆融性,强调容忍、处事的智巧以及独特的内在魅力,在与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或道教)等思想意识以及风俗习惯相接触碰撞、融合会通的过程中,逐渐壮大繁荣,发展成为我国富有本民族和区域特色的重要宗教。佛教并与儒、道并立,成为我国传统文化

中的重要支柱,对我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其广泛和深刻的影响。

北京作为都城,若从辽南京算起,已有千年的建都历史,是千年的古都,同时也是多民族、多种宗教文化的交汇融合地。佛教是北京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北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并结合现存文物及考古发掘成果,佛教在北京的传播和流行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即西晋、十六国和北朝的传入期,隋、唐和五代的发展期,辽、金、元的兴盛期以及明、清两朝在经历了鼎盛期后而渐趋衰落。这种发展状况的形成,应该说与北京历史地位的转变是一致的。隋、唐以前,北京一直作为封建王朝的北方军事重镇。辽代的北京是辽南京的所在地,其政治地位由统一政权下的一级地方行政区划上升为割据政权中的陪都。金代的北京是金中都的所在地,则转变为割据政权的正式都城。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结束了五代以来我国封建政权长期分裂的局面,恢复了大一统的局面。此时的北京作为元大都的所在地,正式上升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北京的这一历史地位一直延续至明清两朝。

佛教在北京的传播和流行,对北京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它不仅满足了当时的各阶层人物在宗教信仰、艺术审美等方面的需求,也为我们留下了大量丰富多彩、形式多样且异常珍贵的历史遗迹,滋养

且培育着我们当前和将来的精神生活。北京现存的佛教文物古迹数量众多,有寺庙建筑、佛像雕塑、摩崖题刻、塔幢碑石、墓志石函、法物器皿等等,是我们了解、研究北京历史上佛教存在和发展状况的重要资料。其中,以不同形式载体为依托的石刻文字材料是最为珍贵的文献材料之一,流传至今,保存并记载了大量有关北京地区佛教事业的详细状况,包括寺庙的历史沿革,如新建、重修、建筑格局、所属派别、佛事活动等等;僧侣的生平事迹,如活动范围、宗派传承、著述撰写等等,这些都与北京佛教乃至社会生活密切相关。

以往,对于北京佛教石刻文字资料的收录,分散于不同时期的各种历史文献之中,包括撰写者的文集,如元好问的《遗山集》、程钜夫的《雪楼集》、袁桷的《清客居士集》、王恽的《秋涧先生全集》、虞集的《道园学古录》、赵孟顺的《松雪斋外集》等等;北京地方志,如《析津志》、《天府广记》、《春明梦余录》、《顺天府志》、《日下旧闻考》等等;某一历史时期的文章纂辑,如《全唐文》、《全辽金文》、《全元文》等等。此外,还有各类考古发现的石刻以及现存散落在各处的石刻等等。从全面、整体研究的角度出发,相关资料的分散不利于考察北京佛教历史和文化的流传状况。因此,我们在尽力全面搜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有选择性地收录了一定数量的石刻,并加以研究,以求反映出不同历史时期北京佛教传播的特点。

北京地区现存的最早的寺庙之一是位于门头沟区的

潭柘寺,“先有潭柘寺,后有幽州城”是一句妇孺皆知的民谚。据后人记载,潭柘寺创建于西晋时期的华严法师,初名嘉福寺,因此很有可能早在公元4世纪中叶,佛教就已经在北京地区开始传播了。1977年,在延庆县宗家营子出土了一尊铜造像,座背面有铭文:“大代□□□□□日弟子□德□□为□……”铭文中所记的“大代”,是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继代王而改国号为魏的北魏,因而这尊佛造像的年代应属于北魏时期。在海淀区苏家坨镇车耳营村原有北魏太和时期的造像,背光背面雕有124个小佛像,并有北魏纪年铭文,应是现存的目前所知的时代最早的北京佛教文字材料之一。

隋朝完成了统一大业,并且由于隋文帝杨坚少年时曾由比丘尼智仙养育,与佛教结下了很深的渊源,因此佛教得到了隋朝统治者的大力支持。隋文帝曾三次向全国各州颁发佛舍利,并敕令建造舍利塔,在云居寺雷音洞内发现的三颗佛舍利和盛放舍利的石函铭刻(即《雷音洞佛舍利函铭》),应与隋文帝的崇佛有着密切关系。隋朝末年,静琬法师秉承先师遗志,开始在位于房山区的石经山(也称白带山)发愿刻经,这一壮举得到了隋炀帝和皇后、贵戚们的大力支持,不仅刻完了《大涅槃经》等经,还修建了云居寺,成为北方佛教的一处圣地。在距离石经山不远的上方山兜率寺,也修建于隋代,并成为日后一处重要的佛教活动场所。

在隋代佛教发展的基础上,唐代北京的佛教发展更

为迅速,在幽州城内和附近区域新建或者重建的寺庙可达上百座。唐朝初年,唐太宗为悼念征讨辽东而阵亡的将士,在幽州城内东南隅修建了悯忠寺,该寺历数朝而不衰,成为北京城内最悠久的文物古迹之一,是今天法源寺的前身。静琬法师于贞观八年(634)完成了《华严经》的刊刻,并在藏经的华严洞留下题刻,即《贞观八年静琬镌华严经堂题刻》。静琬法师于贞观十三年(639)圆寂,但是他开创的刻经事业由其四代弟子相继主持,刻经百余部,分别藏于各个藏经洞内。刻经事业除了得到官方政府的支持,云居寺还成为周围信徒的活动中心,建塔、造像、出资刻经等行为都留下了相关的石刻记载。唐中期高僧真性,于唐德宗时住持云居寺,在白带山研习佛教律宗一派的戒律,并且主持了晚唐时期的石经刊刻,成为四方响应的名僧,其事迹详见于《大唐云居寺故寺主律大德神道碑铭并序》。禅宗中的南宗一派在北京地区的传播始于安史之乱后,并逐渐形成了以盘山为中心的传播基地,盘山也由此开始成为北方的一处著名的禅宗道场。名僧晓方于唐文宗时来到盘山弘扬佛法,并建造了甘泉普济寺,对禅宗在北京的流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事迹见于《唐故甘泉院禅大师灵塔记》。这一历史时期,北京的摩崖石刻造像也发展起来,现存可知的有孔水洞、云居寺、上方山、云水洞等处。北京唐代石刻保存至今的,数量最多的地区就是房山云居寺,这反映出当时的云居寺是北京地区最为重要的、影响力最大的佛教场所。

五代时期,北京经历了后梁、后唐和后晋三朝。云居寺仍是最为重要的佛教场所,信徒的供养行为绵延不断,《房山北郑辽塔出土残石刻》和《房山北郑辽塔出土陶幢》都是有力的见证,同时也表明了密宗信仰的流行。

辽是契丹族建立的封建政权,五京中的南京是辽境内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也是佛教辐射传播的核心地区。特别是在辽圣宗、兴宗、道宗三位皇帝的全面支持和高度推崇下,佛教发展更为迅速。在帝王的崇佛、佞佛的风气下,社会各个阶层,上至皇亲贵戚,下到士庶百姓,对佛教的热情普遍高涨,建寺庙、立塔幢、刻经版、结邑社,行为的方式多样。辽圣宗的次女、兴宗的妹妹秦越大长公主晚年信奉佛教,将自己在燕京棠荫坊的私宅舍为昊天寺,并附带稻田百顷,户口百家及枣栗蔬园等。但是寺庙尚未建成,秦越大长公主就去世了,其女懿德皇后施钱十三万贯,道宗皇帝助资五万贯最终将寺和塔建成。《昊天石塔记》、《燕京大昊天寺碑》、《燕京大昊天寺传菩萨戒故妙行大师遗行碑铭》等记载了这一史实,是皇室成员大规模建寺的例证。韩绍芳是幽燕地区世家大族韩延徽家族的后裔,于辽圣宗太平年间任涿州刺史时,在白带山发现了贮藏的石经,并了解到唐末以来未能续刻,于是奏请辽圣宗,恢复了石经山的刻经,使唐末五代以来中断了的刻经事业得以延续,到清宁三年时,完成了《四大部经》的全套。《石经山韩绍勋题刻》、《云居寺东峰续镌成四大部经成就碑记》、《大辽涿州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等

石刻中有详细记载。另外,辽代北京经幢的数量激增,有高僧法师的墓幢、塔幢,也有信徒所建的经幢,反映出密宗信仰的广泛流行。尤其要提到的是,在阜成门外发现寿昌三年(1097)董庠墓志刻石一块,墓志的首段记墓主人的职官,中间刻“灭罪真言”、“智炬如来破地狱真言”、“生天真言”,经咒为汉字音译梵文。其末行有“所有勋业、异政、氏族具如幢文,故此不书”,据此可推断该墓地原本建有墓幢。这方墓志中刻有密宗经咒,非常特别,在辽代石刻文物中非常少见。士庶百姓的佛事活动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组织“千人邑社”。这种团体是民间自发组成的,以僧侣或地方官员辅助运行的、协助本地区寺院举办各种佛事活动的民间性质的佛教组织。《重修云居寺一千人邑会之碑》、《芹城邑众再建舍利塔记》、《房山天开塔舍利石函记》、《云居寺供塔灯邑记》等是其中的颇具代表性的石刻资料,民间崇佛的风气由此可见一斑。

金朝是女真族建立的封建政权,海陵王完颜亮迁都北京,定为金中都,北京开始正式成为独立政权的都城。北京的佛教事业基本延续了辽代时的繁盛局面,但是佞佛的风气有所抑制。云居寺仍是重要的佛教圣地,名僧辈出,塔幢林立。《石经山云居寺故提点谦公法师塔铭》记录了义谦法师的生平和相关建寺情况,是研究金代云居寺的重要史料。可惜的是,这座被叶昌炽称赞为经幢中稀有之品的石刻,现已无存了。金代,云居寺的刻经事业虽已衰落,无法与唐、辽时期相比,但仍有所继续。据

《入道沙门见嵩续造石经之记》记载，沙门见嵩有感于静琬法师开创的刻经事业后继乏人，便发动众人续造石经并埋于石室内。上方山也是金代一处重要的佛教道场，时称六聘山，分布着下院、中院和兜率寺为中心的寺院群，合称六聘山天开寺。《天开寺奉先县禁山榜示碑记》记载了寺院的僧人状告周边村民砍伐山林，官府特立此碑为凭。这是一件现存较早的反映环境保护的碑刻。银山塔林是大延圣寺中高僧的墓塔，号称“昌平八景”之一。《重建大延圣寺碑记》记载了大延圣寺的创建、规模和布局等情况，碑中同时还刻有《隐峰十咏》，是当时少见的带有诗文的碑刻。

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结束了我国五代以来，特别是辽、宋、西夏、金等政权之间长达 300 余年之久的割据和对峙，开创了一个疆域空前广大、多民族日益融合的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北京，如果说在之前的金代只是一个地方性政权的都城，那么此时则正式地成为了整个华夏的中心。蒙元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政策，其中尤其优待、崇信佛教，从而促进并推动了北京佛教事业的繁荣。至元年间，在修建元大都外郭城时，为保存大庆寿寺和海云和可庵和尚塔，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将城垣的南部西段向外扩展了三十步。海云印简是禅宗临济派的高僧，先后得到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蒙哥诸汗的尊崇，忽必烈曾从其学习佛法，考古发掘的《海云和尚墓志》及流传至今的《大蒙古国燕京大庆寿寺西堂海云大禅师